

# 入党前后的那些日子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朱训



1946年1月17日,朱训入党后于淮阴拍下的照片。



朱训佩戴中共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留影

今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今年,也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75周年。

入党前的日子是,沐浴抗日战争烽火,分享抗战胜利喜悦!

入党后的岁月是,投身三年解放战争,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 共产党来了!共产党真好!

我是江苏阜宁县人,1930年出生于江苏阜宁县五汛镇(今滨海县五汛镇)。

我是幸运的。在我刚年满十岁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来到了我们的家乡。

那是1940年的事。

1940年秋,由陈毅、粟裕率领的渡(长)江北上的新四军和由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后划归新四军序列)由北方南下在江苏盐城白驹镇胜利会师,从而开创了苏北盐城阜宁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简称盐阜地区)。

新四军来到我们家乡后,很快把盘踞在盐阜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赶跑了,日本鬼子因怕挨打而整天龟缩在县城里不敢肆意出来扫荡,长年祸害老百姓的土匪武装也很快被肃清。

其间,抗日民主政府还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大大减轻了贫下中农的负担!根据地人民都过上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大家都以亲身的感受异口同声地说出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共产党真好!”

“共产党真好”这句发自根据地人民内心的话也深深地扎根于我的心中。

### 担任儿童团长,开启抗日活动

1941年,皖南事变后,党中央指示重组了新四军,并由刘少奇同志任政治委员,陈毅同志为代军长。

重组后的新四军军部一度驻扎在我舅舅家的村子里(江苏阜宁亭子港村),当时我在那里读小学。

军部到了我们那里之后,民运部门迅速开展了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这时有一支名震中外新安旅行团来到了盐阜区,一部分团员来到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当时我在那里上五年级,不知道怎的要我担任抗日儿童团长。

当年我们儿童团主要有三项任务:一是站岗放哨,查路条捉奸,二是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三是组织团外儿童识字唱歌跳舞等。

抗日儿童团当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逢年过节代表村里人送一篮鸡蛋给新四军军部,以表示慰问。

有一天,我和两个小朋友在村口站岗放哨,看到有一位身着灰色军装的老者(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新四军

政委刘少奇同志)从军部那边走过来。不一会,他来到我们面前说:“小朋友,你们干什么啊?”这时我旁边一个小团员说:“我们是儿童团,在站岗放哨。”刘少奇同志说:“儿童团也能干大事!我身边另一个团员指着我对刘少奇同志说,他是我们的儿童团团长!”

于是,刘少奇同志笑呵呵地摸着我的头说:“噢,你是猴子王!”

就是这样,在刘少奇同志所说“儿童团也能办大事”的鼓舞下,我这个猴子王和儿童团员们一道在1941-1942年这两年遵循儿童团应尽的责任和任务从事着抗日活动。

### 考入盐阜联中,实现入党梦想

1942年秋,经我的哥哥、中共党员朱诚的指点与辅导,我考入了刘少奇同志倡导创办的盐阜区联立第一小学(简称盐阜联中)初中一年级学习,从此开始接受系统的革命教育。

当年联中学习条件相当艰苦,因为当时根据地实际上还处于半游击区的状态,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不时地骚扰,敌人来了就转移,敌人走了就上课,没有固定的校址,没有固定的教室。我就是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状态下学习了五年。

在盐阜联中学习五年,特别是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使我了解到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走进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规律。

五年间,通过学习政治课,通过老师的教育,辅导员的辅导,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

由于理论学习和在根据地耳闻目睹的亲身感受,使我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好!从而下定决心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跟共产党走!

于是我把我的认识向辅导员和班主任作了汇报,同时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这时也引起班主任和辅导员对我的关注。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1945年,我初中毕业了。

盐阜联中为适应抗战胜利后建设新中国对人才的需要而改为苏北工业专科学校。我进入高中部化工科学习,

勤工俭学半工半读,享受供给制待遇。

1945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上午,班主任找我进行了一次正规的谈话,周石谷主任对我说:“朱训,根据近三年对你的考察,你已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条件,但是党章有了新的规定,不再发展少共党员(年满14周岁可以入党),待一年后你年满16周岁时再吸收你加入我们的党。”

在“苏北工专”学习期间,我和化工科的同学都参加了校工厂制造肥皂的劳动。这时肥皂的牌子叫“工专肥皂”,不仅经过上百次试验,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达到通用的肥皂标准,而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除供应盐阜地区军队外还可以提供根据地民众使用。

现在在淮安市苏皖边区政府纪念馆陈列室还陈列着一张“工专肥皂”的大幅照片,作为反映当年解放区生产的成果。

转眼到了1946年初,春节刚过,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正在村中广场进行文艺演出,记不清了当时是什么人通知我:“尽快到学校里去!你被批准入党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于是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很快收拾了简单的学习用品,步行120华里路来到了淮阴清江,找到了学校。这时苏北工专已划归华中建设大学管理并更名为华中建大附中。

辅导员武庆元同志告诉我,党组织已于1946年1月17日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为校教导主任李克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外贸部副部长)和他二人,并定于三月十号举行入党宣誓。

当时正处于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的前夕,国民党的飞机不时地来骚扰,国民党的特务也猖獗活动,战争乌云笼罩着城市的上空,党还处于秘密状态,没有对外公开,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秘密地进行了入党宣誓,实现了入党的梦想。

### 投身解放战争,迎来新中国诞生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内战全面爆发,并派出大批军队向苏北解放区进攻。

党中央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实行战略转移,主动

放弃了一些城市,将新四军的主力转移北上,只留下少数部队在苏北敌后坚持。因此,一些重要城市很快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而苏北一些地区也因此处于半游击区状态。

鉴于当时的战争形势,华中建设大学党委决定将建大附中一分为二,一部分可以随新四军主力北上的师生与建大本部一起北上山东,另一部分适于留在苏北坚持敌后斗争的师生以江重言校长和建大附中化工厂厂长徐以达老师为首留在苏北。

当时给留在苏北的师生有两项任务:一是视战争形势许可学校复学复课,二是生产日用化工品供给坚持敌后的新四军使用。

为了适应后一个任务的需要,学校决定附中化工科的同学一起随徐以达老师负责保护化工厂的设备仪器并寻找生产。

就是这样,根据党组织的要求,我成为徐以达老师团队中的一员。不久,为了更好地适应军队对日用军需品的需求,徐以达老师负责的建大附中化工厂被划归新四军华中建设管理处领导,并更名为华中建设化工厂,从此我们正式成为新四军的一员。

1946年秋,在徐以达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一行七八个人用一艘木帆船将化工厂的主要设备仪器从淮阴阜宁益林运到建湖县一个名为“符鹤桥”的地方,在一个废弃的地主庄园里将工厂安置了下来。

在这里我们待了一年,敌人来了我们就转移,敌人走了我们就生产,当时我们生产两种产品,一是供坚持在盐阜地区的新四军使用的牙粉(当时因国民党封锁解放区没有牙膏),二是军民两用的肥皂。

肥皂的名字叫“大江肥皂”。当时我们的经费非常困难,为了减轻一点困难,徐厂长决定办一个小商店,主要卖肥皂并卖一些油盐酱醋和少量纺织用品,以方便附近居民。商店定名为“大江商店”。

徐厂长要我当商店经理,另在本地请一位懂经营的人协助。

商店经营了近一年的时间,确实收到增收和便民的双重效果。

1947年夏,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我们被迫将工厂转移到射阳县一个名为“汉鹿港”的地方继续坚持生产。为了适应战争需要,我们又开始生产酒精。

1948年秋,由于我将侦察到的敌情及时报告给厂领导,使工厂人员设备及转移避免了损失而荣获一等奖。

在这里,我们一直坚持工作到淮阴解放。

1948年11月6日淮阴解放后,我们和工厂一起重返故地。我们的工厂一道被划归地方政府管理,并更名为淮阴光华化工厂。

1949年10月1日上午,我为淮阴光华化学厂的党支部书记、代书记正和同志们忙碌着,工厂的广播喇叭突然传来了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顿时全厂一片沸腾,欢呼雀跃,齐声高呼新中国成立了!新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本文作者为原国家地质矿产部部长,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以送《三国演义》等书作试探,然后就有计划地送哲学、经济学等书籍,这样,十多种进步书籍,陆续被送牢中,甚至还夹带了《论持久战》单行本等。这些书在狱中秘密传阅,有的难友风趣地把监狱称为“香港大学”。

狱中的邹泽沛曾给江津同乡同学黄宇齐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他在上海的“生意”蚀了本,很困难,这实际上是暗示他已被捕。1939年初冬,老家龙门场沱湾街二弟邹泽锡收到一封来自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信,信中称邹泽锡为“表弟”,写信人自称为“表兄李文新”,信中说他正在狱中。邹泽锡一看便知是大哥邹泽沛笔迹,此信证实了黄宇齐早前暗中传来的信息。邹家人忍受着悲伤,寄钱到监狱。父亲闻此消息,心痛不已,于三天后溘然而逝。

邹泽沛并不知道父亲离世。他在狱中坚持着斗争。他的身体本来就瘦弱,加上营养不良,忘我工作,特别是狱方的折磨,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但他在斗争中越来越坚强,敌人发现他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头头”,对他折磨和拷问就越来越狠毒,总使出各种伎俩折磨他。

邹泽沛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向狱方提出购药,狱方根本不予批准。他整天咳嗽不止,有时咳出血块。

1941年7月的一个深夜,年仅28岁的邹泽沛在狱中牺牲,他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59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由毛泽东签署的“字第01306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邹泽沛名列其中。



## 鲁迅与邵飘萍的交往

崔鹤同

鲁迅和邵飘萍是同代人,又都是浙江人,鲁迅生于1881年,比邵飘萍年长3岁,也都曾留学日本。

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立即撤掉《京报》上的所有商业广告,用几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五四运动的消息和图片,他还撰写了《愿国民注意根本问题》等20多篇时评,谴责帝国主义的暴行。鲁迅则在《京报》上发表了多篇杂文,鼓励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作长期的坚决的斗争。

1924年12月5日,邵飘萍创办《京报》副刊创刊,并邀请孙伏园担任主编。孙伏园是鲁迅的密友,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孙伏园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在《京报》副刊上,鲁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先后发表了37篇杂文,翻译了5篇文章,都脍炙人口,声名远播。接着,邵飘萍又约请鲁迅在《京报》上主编一个周刊《莽原》,并于1925年4月21日面世。《莽原》共出版了32期,鲁迅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等41篇杂文和小说,就是在这上面发表的,大受

读者青睐。

1925年1月,女师大风潮爆发后,鲁迅和其他女师大教员联合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抗议杨荫榆对学生的迫害。邵飘萍除了在《京报》上刊出大量同情学生风潮的消息之外,还亲自撰写了《五七潮杂感》等评论文章,声援师生的正义斗争。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邵飘萍在陈毅主持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并在《京报》上发表《诛袁贼》等著名时评,鲁迅则愤怒地称“三一八”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在《京报》上发表了《可惨与可笑》《如此讨袁》等杂文,无情揭露段祺瑞政府的罪恶行径。正因为如此,“铁肩辣手”的邵飘萍和“横眉冷对”的鲁迅,都被纳入反动当局的黑名单,遭到通缉。

鲁迅和邵飘萍的交往,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但因为共同的志向和斗争的洗礼,使他们并肩前行、互相支持,成了情同手足的战友。



## 艾青取笔名

周二中

诗人艾青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艾青爱得深沉,也恨得激烈。

艾青1910年3月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192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我们知道,后来的艾青是以诗闻名世界,这也是阴差阳错,艾青在谈起年轻时由画画转变为写诗时,曾不无幽默地称之为“母鸡下了鸭蛋”,这是后话。

后来艾青到法国巴黎勤工俭学。一次,他去一家早点铺吃早点,听见一个顾客对店主喊道:“给我几个‘中国人’。”原来该店最近出售一种香甜酥软的点心,起名“中国人”。这一幕让年轻的艾青感到愤怒与痛苦。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对中国虎视眈眈,全世界的列强都想再吃“中国人”一口。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1932年艾青回国,5月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

盟。同年7月12日晚,“春地画会”上世界语课时,遭法租界巡警袭击,艾青同12个美术青年一起被捕,当局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罪”移送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当时被判6年。

入狱的第二年,艾青想到自己的乳母(艾青自幼由一位贫苦农妇养育到5岁),写下了著名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原名蒋海澄,作为囚犯,肯定不能用实名发表作品的,艾青焦虑于国家危亡,痛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于是毅然提笔把自己“蒋”姓下面“蒋”字“×”去,变成“艾”字,大有一种“人自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的意思。他原名“海澄”,“澄”在他的老家金华读如“青”,于是笔名的第二个字就用“青”。从此,“艾青”成了他的常用笔名。此诗由律师沈钧儒访谈时带出交友人李又然,1934年发表于《春光》杂志第一卷第三期上,一时间震动了诗坛。



## 辜鸿铭当翻译

沈治鹏

1884年7月,在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上,两广总督张之洞慕僚杨汝澍与辜鸿铭邂逅。此时,辜鸿铭正与一位德国人用德语交谈逻辑学,其间不时插入英语、拉丁语,而且中文也讲得十分流利。杨汝澍十分惊叹这位年轻人的才华,回去后立即通过广东巡抚赵凤昌向张之洞举荐辜鸿铭。自此,辜鸿铭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外交顾问秘书。

1891年,俄罗斯帝国皇太子与希腊王子结伴同游中国,他们一行来到武汉。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带着几个僚属前去迎接,辜鸿铭担任随行翻译。在欢迎宴会上,俄皇太子用法语与张之洞交流,却在宴席期间与希腊王子用俄语抱怨餐品卫生问题。没想到,他们刚刚语音一落,辜鸿铭旋即转译过去,笑着用俄语对他们说:“这些菜肴新鲜又卫生,还望你们放心地尽兴尽量。”两

位王子猝不及防,脸上立刻露出惊讶、尴尬之色。

宴罢,张之洞掏出香烟盒吸烟,希腊王子不知为何物,转身用希腊语问一旁的俄皇太子。辜鸿铭不动声色地翻译给张之洞听,并拿过鼻烟壶,递给希腊王子,用希腊语告诉他鼻烟壶的使用方法。听着这位年纪轻轻的中国人同时操着几国语言,在如此高规格的外交场合轻松地自如地准确翻译,这两位外国皇太子和王子惊诧不已。

后来,当他们得知辜鸿铭的博学多才和天才般的语言天赋后,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俄皇太子在离开武汉时,郑重其事地向辜鸿铭发出邀请,希望他有机会游历俄罗斯,同时还将一块刻有皇冠的金表赠给辜鸿铭。武汉之行给俄皇太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来曾说:“在武汉见张总督,那位翻译辜先生所通语言之多,是我遍历各国所难以找到的奇才。”



## 罗家伦创作《玉门出塞》

周惠斌

“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天山溶雪灌田畴,大漠飞沙旋落……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儿射西域盘踞。”这首题为《玉门出塞》的歌曲,自1934年问世后,深受人们的喜爱,迅速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广为传唱。

《玉门出塞》的词作者罗家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北京大学就读的罗家伦主动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口号“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成为学生领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悍然侵占东北。罗家伦时任清华大学校长,他“悲愤难言,常请笛声,而励士士气”,以“扫荡敌人侵略”“雪我祖国耻”为主题,创作了《淞沪战歌》《童子军团歌》《国旗歌》《炮兵歌》《空军歌》《军歌》(三首)等歌词作品,表达了“愿我全国同胞,

全体将士,奏此乐歌,踔厉奋发,以赴疆场,以歼顽敌”的爱国主义情感。当时,列强图谋侵占、瓜分新疆之心已昭然若揭,身为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忧心如焚,“复感西域危机不让东北,爰藉《出塞》之歌,以报天国之警。”于是,一首壮怀激烈、直抒胸臆的爱国歌曲《玉门出塞》(李惟宁作曲)应运而生。歌词中,罗家伦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生动地描绘了春风拂拂下,玉门柳树枝繁叶茂,巍巍天山气象万千,茫茫大漠万马成群,沃野绿洲瓜果飘香,形象地展示出西北塞外的旖旎风光和绚丽画卷……

《玉门出塞》被誉为抗战前的“三大杰作”,在全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以巨大的文化感召力、高亢的爱国向心力,激励华夏儿女同仇敌忾、保家卫国,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杀敌沙场的英雄气概和砥砺前行的必胜信念。

## “复旦英烈”邹泽沛

庞国翔

复旦大学校史馆的“复旦英烈墙”上,红色五角星嵌中的花园图案下,有这样三行文字——邹泽沛(1916年—1941年),四川江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9月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学习,1936年4月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被捕。1941年7月在狱中病逝。

校史馆除了简短的文字外,没有其他任何资料。笔者走访了江津龙门场邹氏家族,又查阅上海市青年运动史、上海市党史和上海市档案馆提供的资料,终于,一个血肉丰满的英雄人物展现在眼前……

### 在上海参加革命

1934年,21岁的邹泽沛来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入学后不久就参加党组织领导的“教联”,接着入团。

邹泽沛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一边积极参加学潮,策划学生运动。邹泽沛常到街上进行宣传演讲,声音洪亮,滔滔不绝,很快就会吸引一大群市民倾听,并赢得阵阵掌声。

邹泽沛接到上级指示,要他到同济大学组建团组织。他立即来到同济大学,代表组织与同济大学的李欣、陈平

及唐英之等3位团员接上关系。不久,正式成立同济大学团支部,邹泽沛对团支部工作进行了认真安排和部署。

这一年,邹泽沛给老家寄来一封信和照片。信中话不多,只说他在复旦读书,很认真,也很辛苦。一张照片是身穿白色漂亮的学生装,手扶着一辆自行车,脚穿皮鞋,很洋气。他的目的是想告诉家人,他在上海的条件是挺好的,请家人放心。其实,外地早有消息传回老家,说他在上海根本没有读书,而且参加了“乱党”组织。

不久,邹泽沛被调往江苏省委团委,并任上海沪西区团委书记。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沪西区委组织部长。由于他出色的演讲口才和宣传鼓动能力,1936年1月,他又被任命为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邹泽沛非常关心上海各大学团组织的工作,常去参加支部活动,帮助制定发展规划。

1936年4月1日晚,这是一个漆黑的深夜,共青团江苏省委遭到破坏,邹泽沛不幸在公共租界被捕。

### 血染提篮桥监狱

与邹泽沛同住的共青团江苏省委

代理书记许亚也同时被捕。他俩被一同收押在新闻捕房里。其实,当局并不了解他们真实具体的身份,同时也为了抢功,就没将他们引渡给国民党警察署,而直接向捕房向公共租界的法院起诉。

由于邹泽沛语言缜密、逻辑性强,捕房前后4次提讯,他们的口供都一致,当局找不到一点破绽。捕房只能根据抄获的一些证据,宣判他们是共产党重要分子,煽动工人、市民阴谋推翻租界的统治,秘密广泛听取意见。经过酝酿和协商,成立了“同难社”。他们还创办《同难生活》杂志,并以此为阵地,开展斗争。

许亚、邹泽沛又暗中筹建狱中团支部,二人还被选为团支部负责人。狱方是很害怕犯人进行政治活动的,他们规定除了《圣经》等宗教书籍以外,其他内容的书都不准阅读更不准犯人亲属送入。“同难社”便向狱方提出准许亲属扩大送书范围,准许用被捕时身上的存款买书的要求。经过若干次的斗争,狱方终于同意他们的“读书要求”。犯人家属一开始